

第二章 社會主義在日本社會的傳播

十九世紀末葉，殖民主義與「民族國家體制」跟經濟和工業發展無法協調的情況下產生帝國主義，繼而發展為為擴張而擴張的政治型態。帝國主義時期的權力政治最明顯的特色在於：從這種有界限的、區域性的，因此而可預料到的民族國家利益的目標變成一種毫無界限的、為權力而權力的追逐。（Hannah Arendt：1982）。

天皇政權誕生後即維持一貫侵略主義的日本，初期是爲了加強天皇政權的威信，再加上以往深受歐美侵略的壓力，轉而通過壓制弱小鄰國找回民族的自信心。甲午戰爭的勝利，除了使日本更加速侵略的步調外，更使國內的資本家解決了國內發展的經濟困境，掠奪海外的原料及勞動力使其成爲更大的資本，而資產階級再與上層的政權結合，形成日本帝國主義與壟斷資本結合政體。

社會主義的思想就是在這樣的社經環境下萌芽的，日本的財閥與資本家向內極力壓榨貧弱的農民及勞工，致使民怨叢生，對外則聯合天皇擴張海外殖民地，奪取資源。一再的窮兵黷武，使得日本國內爆發了許多的勞農運動及抗爭事件。當時日本的學者除了反對開戰之外，更受到了當時盛行的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呼籲天皇政府應關心所有的平民，而社會主義思想散播的有利人士當屬一幸德秋水，他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和日本政府做積極的抗爭，雖然之後在大逆事件中受到處決，但更鼓勵了之後的左翼人士組織日本共產黨此一組織，日本共產黨在第三國際中擔任台灣共產黨建黨的指導者，對當時台灣左翼政治團體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日共與中共究竟何者才是台共建黨的指導團體，更是台灣日治政治抗爭歷史的爭議之一。

第一節 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產業的確立

一、資本主義與地主制的結合

（一）日本甲午戰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變

1. 城市人口及商用作物增加

資本主義的發達對農業和農民的影響日益加深。農戶數自十九世紀七

十年代到甲午戰爭前，其絕對數有所減少，所以，其在全國總戶數中的比率，也已相當的速度降低下來。一八七三年農戶數約為五百六十四萬戶，占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七十八點七；而一八九一年則為五百四十九萬戶左右，占百分之七十點三；一九〇三年就很快減少到百分之三十六萬戶，佔百分之六十四點一（此後實際數量開始稍有增加）。由此可以得知，農業人口在資本主義的形成確立朝向農業之外，其絕大部分為資本主義企業，而資本主義的產業也相當迅速的發展起來。

日本資本主義體制因甲午戰爭的影響，不僅產業性質產生改變，城鄉的勞動力也明顯的產生變動。明治時期日本工廠和勞動人口的變動，以及城鄉人口結構的改變，如下表 2-1、表 2-2

表 2-1：明治末期日本勞動力變動表

明治末期日本勞動力變動表								
時間	明治 25 (1892)	27 (1894)	29 (1896)	32 (1899)	35 (1902)	36 (1903)	40 (1907)	42 (1909)
工廠總數	2767	5985	7072	7284	7821	8273	10938	15426
使用原動力工廠	987	2409	3609	2388	2991	3715	5207	6723
百分比	35.51%	40.12%	39.9%	32.79%	38.26%	20.38%	47.58%	43.58%
工人數		381390	436616	422019	498891	483430	643292	692221
男工		141914	174656	164712	185622	196226	257356	240864
女工		239476	261960	257307	313269	287304	385936	451357
女工所佔比例		62.79%	59.99%	60.97%	62.85%	62 %	59.08%	65.20%

*資料來源：引自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頁 259，台北：商務，1967 年。

表 2-2：日本城鄉居民比例表

日本城鄉居民比例表			
時間	明治 20 年(1887)	明治 40 年(1907)	大正 4 年(1915)
城市	7771(千戶)	8734	9729
比率	28.99	38.10	43.99
鄉村	19034	14188	12387
比率	71.01%	69.9%	56.01%

*資料來源：引自町田辰次郎〈日本社會變動史觀〉，頁 54，東京：東京堂書店，1924 年。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了，特別是六大城市：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戶及福岡的人口數大幅的增加。非農業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其大幅的增加，致使對稻米等農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多，並促進了其商品化。在這種刺激之下，稻米播種面積增加了，農具改良了，施用肥料也增多了，因此總產量從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的五年平均年產三千七十八萬石增加到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的五年平均年產三千二百四十七萬九千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¹。早田作物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棉花、甘蔗、葉藍這種以往最重要的工業原料作物，在進口貨的衝擊下幾乎滅絕²。使用國產原料的農村手工業、製造業也消聲匿跡，甚至在雜糧中農家自用的粟、稗生產也稍有減少；另一方面程式近郊的農家，各地的馬鈴薯、甘藷的生產則急劇增加，除蟲菊和啤酒用麥作為新工業用作物投入生產，蘋果、柑橘、桃等果樹栽培也作為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特別是由於生絲出口的增加，養蠶的發展更為迅速。

2. 舊有農村體制破壞殆盡

農作物的商品化和商業性農業的發展、舊有的家庭手工業的沒落，讓農村的自主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破壞，造成了農民與農業捲入了資本主義的局面。以通曉農村實況而出名的農林省技師齋藤萬吉（1911）在《實地經濟農業指針》中說：「農戶購買品的價格逐年上漲，非米價騰貴可比」、「子女教育及其

¹甲午戰爭過後，從滿洲進口價廉效高的豆餅壓倒了以往的魚肥，以過磷酸石灰為主的化學肥料也開始普及了。硫銨的進口雖是少量但也開始使用，在政府的獎勵下改革了共同秧田、直線插秧的技術。

² 1896 年，由於紡織資本家的要求廢除了棉花進口稅，這對棉花生產是一項致命的打擊。葉藍由印度進口貨取而代。本土的甘蔗被沖繩糖和進口糖所壓倒。資料來源井上清 著、宿久高等 譯 1986，80。

他社會交往等需要巨大費用」、「農戶無法僅靠以往農業維持生活」、「事態已至無暇論即將來如何，只是一昧致力於可增加現金收入較多之任何工作」。而所謂可以成為“現金收入”的工作，是商業性農業，是取代老家庭手工業的新家庭手工業，是季節性臨時工及其他掙工資的勞動，許多農村的女性成為紡織女工或其他各種各樣的“農戶副業”。出現了貧農與小農的半無產階級化、上中農的小商品生產化的跡象。

（二）日本農村經濟走向崩潰

1. 地主和資本制的雙重壓迫

作為日本農業基幹的米麥生產寄生在地主制與國家重稅的壓力下，卻無法從自家勞力從事的小規模經營中解放出來，自耕地主的寄生地主化傾向也隨者資本主義產業的發展日趨明顯。當時農戶的子女去城市作工的越來越多，農業工人的工資也應該要比以前稍作改善，但對地主而言與其付出較高的工資進行大規模經營，不如當寄生地主袖手坐拿近六成的地租更為有利。據一九〇八年的統計資料，在所有農戶之中，百分隻三十七的耕種面積尚不足五反³，百分之三十二點六不滿一町⁴，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為純佃農，百分之二十九為自耕農兼佃農，純自耕農僅占百分之三十三，而這種情形到一九〇〇年後也是大致如此。而這對於經營不到一町的佃農和自耕農兼佃農，資本主義對農民的滲透，成了生活品質下降的原因，如同上述齋藤所說的現金支出增多而收入卻沒增加的情況；徵收的土稅被迫轉嫁給佃農，國家又透過專賣捲煙、徵收酒稅及其他間接稅的手段進行剝削，極其嚴重的損害佃農和貧農的利益，逼迫他們只能賣掉自家種植的穀物以粟、稗和薯類的作物充饑。

根據橫山源之助（1949）研究，當時的佃農和自耕的“五反農民”都只是被地主控制和壓迫的對象⁵，小農經營已到了沒有現金無法維持的情況，謂了

³ 日本土地面積單位，約合 991.7 平方米。

⁴ 日本土地面積單位，約合 9,918 平方米。

⁵ 橫山認為當時的佃農他們大多數都被地主用債務束縛住，而本身除作農工外根本不具當工業工人的技術，無法脫離地主而自立；至於“五反農民”的情形同佃農沒有什麼差別，他們的土地經常被用來做借債的抵押，不久就得歸別人，而他們脫手的土地不斷集中到已擁有三町、五町以上的地主手中，出現了三町、五町的大地主。引自橫山源之助，1949：39。

挽救傾頹的農村經濟，一八六八年，以國家資金成立了中央勸業銀行和府縣的農工銀行，經營以不動產作抵押的低利長期貸款以振興農業和農村工業，但這些貸款銀行卻成為專門為地主或製造業資本家服務的金融機關⁶。一九〇〇年開始實施產業合作法，但信用合作社，也成為了地主及資本家搜刮資金送往城市的服務機構。所以不論是不動產銀行或是信用合作社都成了城市資本家及其勾結大地主剝削的機關，小農的金融只有依賴地主、肥料商及糧商等的高利貸，在亟受壓迫的條件下辛苦的生活。其中政府實施的產業合作法雖多少有助於上層農民適應資本主義而地位上升，但對大多數的小農、貧農卻沒有幫助，只能成為地主與資家操縱下的機關。

2. 壓迫下的產業勞動力

地主與城市資本通過不動產銀行和產業合作社勾結起來，並且地主還直接向股票和債券投資，而這些投資成了甲午戰爭以鐵路熱為中心的企業資金的很大來源。地主的投資成為資本機累的重要來源之一。地主和地方銀行的投資興辦了地方無數的小規模企業和製造業，而這些企業產量占工業總產量的一半以上，再通過榨取、控制這些小銀行和小企業，來維持地主及資本家的大資本產業。而資本主義產業下受壓迫的勞動力也是由地主制殘酷壓迫下的小農、貧農所提供的，紡織女工、鐵路港口的工人、煤礦曠工等同樣來自佔所有農戶半數以上的貧農階層，資本家更把農民的悲慘生活作為樣板，把殖民地式的低工資、長時間勞動等級為惡劣的待遇強加給工人，以保障資本家的高額利潤。

資本主義與地主制，以高額地租與低工資的相互依存為中心相互利用，緊密勾結而發展起來，一方面地主身兼資本家，另一方面城市資本家在農村購買土地而成為不在地主的人數也增多了⁷。大地主身兼商業或工業資本家而大大地發展起來，其代表人物有：信州的片倉（櫟絲大王）、岡山縣倉敷的大原（紡織資本家）、名古屋的伊藤（百貨公司）等。新潟的大地主市島經營銀行，山口、內藤成為石油資本家，還身為新潟鐵工廠的創立者。

⁶ 地主將借得低息的長期的大筆資金投入到農業以外的企業，或以高利貸轉借給農民賺取利息差額。另一方面，通過發行銀行債券而將農村的資金越來越多送往城市。

⁷ 1901年9月的《時事新報》，列舉了日本全國五十萬元以上的資本家的姓名、職業，再總數四百四十一人中，有八十八人（百分之二十）的頭銜是“農業”“林業”“大地主”。舊諸侯貴族六十三人（百分之十四點三）和貸款業、釀酒業也大多身兼大地主，故資本家的大半是地主兼資本家。

二、財閥獨佔資本家與天皇政府的同盟

(一) 財閥與政府相勾結

帝國主義者所冀望的是無須任何政治體制的基礎而能擴張政治權力，而這樣的需求和資本相謀合，激發帝國主義者的擴張行動，而權力在向外擴張時也追隨隨著金錢輸出的途徑。日本天皇政府發展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張，可說是國內的資產階級和大財閥所主導的。資產階級產生擴張侵略的概念，主要的因素在於他們面臨工業競爭所造成的經濟困境。而發展海外投資卻是一項冒險的行動，資產階級及財閥只有借助政府的政治權力，將冒險的程度減至最低。此處將財閥認定為「以一個家族為中心而出資成立，在家族支配下擁有獨占或寡占地位的多樣化事業經營體，且其組織規模龐大，對當時的國家經濟擁有頗大的影響力」⁸。在甲午戰爭尚未結束時，當時的日本政府就主張戰後要擴大軍備以作東洋霸主，而在軍備擴張的同時，政府還以「戰後經營」的名義下，加強擴大軍備產業基礎並投入了大量的經費。而這些所謂的「戰後經營」其所需費用的第一來源，便是從中國索取而來的賠款，甲午戰爭的賠款全部都用於增加皇室的財產及下次備戰的準備。更有甚者，政府、統治階級向人民徵收了許多新稅⁹，軍費在國家預算中所佔的比例在甲午戰爭後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

由於不斷的增稅壓迫了民間的金融市場，因此帝國議會曾反對過增稅和擴軍，而從民間一以農民為主的廣大勞動群眾與中小業主一搜括到政府手中的貨幣，再向民間一但不是農民和中小業主，而主要是以特殊官僚資本家為中心的

⁸。森川英正將「財閥」定義為「在富豪之家族同族的封閉性所有支配下，所成立的多樣化事業經營體」，參見森川英正，《財閥の經營史の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80年），頁4。與此定義不同的為安岡重明，安岡定義財閥為「所謂財閥是以家族或同族的母公司（擁有股權的公司），為核心，讓母公司所支配的諸企業（子公司）經營多種產業的企業集團。大規模的子公司在各個產業界具有寡占性地位。」參見安岡重明，《日本經營史講座》第3卷（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76年）頁14。森川的重點為「封閉性支配」，而安岡認為「一家族出資為核心」與「寡占性地位」是財閥之重要內容。若依森川之定義，小都市較小規模的企業團體，若由一個家族投資同時獨占小都市的某些產業，也可以視為財閥。但是安岡位了研究財閥如何影響日本經濟，認為進行考察全國性的獨占地位，焦點較確定；若將小都市的企業集團也包括在「財閥」內，會使問題變得更複雜而分散焦點。參考關口剛思，《三井財閥與日治時期台灣之關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綜合以上之意見，筆者將財閥認定為「以一個家族為中心而出資成立，在家族支配下擁有獨占或寡占地位的多樣化事業經營體，且其組織規模龐大，對當時的國家經濟擁有頗大的影響力」，並以此定義作為論述。

⁹ 在1896年，除增收菸酒稅外，還增收了營業稅，及無論工商業者有無收益，一律增收以資金、營業所面積、職工人數和其他項目為基礎的稅款，並將捲煙改為政府專賣，同年度增加稅款二千六百萬元。1898年政府更進一步計畫大幅度提高地租和增徵酒稅，翌年又以酒稅為中心，在甲午戰爭後第三次強行增稅。戰前1893年簽千萬餘元的稅收，到1903年增加了一倍，為一億四千六百一十六萬元。

大資本家一回流，成為企業資本。由國營企業和同政府結合的財閥獨占企業作為先導，資本主義產業迅速發展起來。此表歸納表示的，是自甲午戰爭前一年的1893年到日俄戰爭前一年的1903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指標。

表 2-3 資本主義發展的指標（1893~1903 年）

指標	1893 年	1903 年	增加率
公司總數（家）	2,844	8,895	3.13 倍
資本金額〔繳納〕萬元	24,500	93,100	3.80
僱用 10 人以上民營工廠數	3,740	8,274	2.21
以上工廠中使用動力機工廠數	675	3,741	5.54
民營工廠工人數（人）	285,478	483,839	1.69
礦山工人數〔當 6 月末時〕（人）	未詳	163,530	—
國營工廠工人數	11,895	61,876	5.22
鐵路開業英里數（英里）	2,039	4,495	2.20
輪船總噸數（噸）	110,205	656,745	5.96
出口貿易金額（萬元）	8,971	28,950	3.23

*資料來源：引自井上清 著、宿久高等 譯〈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頁 70，台北：華世出版社，1986 年。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公司資本的增加，不論是實際數量或是增加率都最高，以資本企業本身的基金為來源而增加的部分並不多，多數是轉化成公司或銀行資本的貴族、地主的公債券和他們用出賣從佃農身上搜括來的地租所得的貨幣與高利貸資本，致使全國財富都集中於少數財閥資本家手中¹⁰。少數和政府、日本銀行有聯繫的特權大銀行，與同政府聯繫密切的企業勾結在一起，發展作為遊歷目的的鐵路及重型製造工業，而在民間資本方面，則掌握棉紡織業、以及手工業和各種製造業的結合，壓迫工人生產以轉取高額利潤。

¹⁰ 1902 年時估計全國存款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十幾家大銀行，其中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鴻池、住友和正金八家銀行的總存款額，在 1901 年已占所有銀行公會的會員航總存款額的百分之五十一。

(二) 財閥與殖民地經濟¹¹相互依存

日本佔據台灣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積極進行經濟開發，在經濟上加以榨取，也包含了對外國資本的驅逐¹²。日治後來台的財閥有三井、三菱、安田、古河，在日本佔領台灣後隔年就來台灣，並注意到台灣特產的砂糖、米、樟腦等商品的價值，由這些特產品貿易開始展開其在台事業。並由商業資本擴大為產業資本，投資製糖業、煤礦開採業，樟腦製造業等，並且和貿易配合壟斷市場。而財閥在與政府的直接關係之下，成立獨占企業，也成就了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的獨占化，也就是獨占資本主義政府的殖民政策。殖民地的經濟，是由資本主義階段飛躍而進，這是資本家經濟發展的情勢。（矢內原忠雄，1929）

學者井上清(1986)也曾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下過這樣的定義：

- 一、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生產和資本趨於集中，以致發展到壟斷組織對社會經濟生活起決定作用的階段。
- 二、 在這一過程中，壟斷產業資本同銀行資本融合在一起，金融資本。少數的金融資本家不僅控制經濟生活，而且“全然不管其國家政治組織及其他任何具體狀況，進入公共生活的全部領域”。此及金融寡頭統治的發生。
- 三、 此種發達的資本主義，不僅輸出商品，而且輸出资本，以此獲得比在本國通常可以獲得的利潤更高利率的利潤。不僅如此，還對資本所輸出的國家或多或少地具有政治的、經濟的控制權力，亦即與商品輸出不同，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 四、 這樣，各國的金融壟斷資本進入世界各地，在激烈競爭的同時，形成國際性壟斷資本家團體——國際卡特爾、托拉斯和辛迪加，在他們之家瓜分世界。

¹¹ 此處表示殖民地的經濟機能，即對宗主國本國在機繼上的貢獻，換言之，本國對殖民地之經濟性榨取，是多數殖民地共通的本質性機能。

¹² 再日本佔據台灣當十，台灣的質億及海運為外國資本家所掌握，但1907年前後，以被驅逐殆盡，原因如下：(1) 日本商人比較外國商人即台灣商人，在競爭上強大的資本力；(2) 日本資本家在台灣設立企業而成產業資本，因此日本商業資本相與結合，比只有單純商業資本活動的外商要有力量；(3) 日本資本在台灣成立銀行資本，即臺灣銀行；(4) 國家專賣制度實施，史輸出入商權轉入日本商人之手；(5) 國家直接而且差別地保護日本資本；(6) 將關稅制度與日本國內統一，使日本、台灣之間的關稅消滅。參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99：40-41。

五、而且，幾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時已經把世界所有的地方分割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地或勢力範圍。世界領土從此瓜分完畢。（井上清，1986）

日本的侵略主義除了擴張領土之外，還在於為已在本國找不到有利可圖對象的資本，尋求有利可圖的輸出地，並防止其他競爭者的闖入；除此之外日本還向弱小國家提供貸款，使對方在金融上甚至政治上從屬於己，背後卻仍有著武力的威脅，這則是壟斷資本主義最慣用的方式。

第二節 日本帝國主義與侵略主義的盛行

霍布遜（1902）在其著作《帝國主義論》中，則將帝國主義解釋為“對於他國、他民族的侵略主義和領土擴張主義”。在霍布遜之前的學者 Joseph Chamberlain 及 Paul Leroy-Beaulieu 對帝國主義更是做出如下定義：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是此強權世界中維繫自己國家生存的必要行為，就連韋伯（Max Weber）也在 1894 年的一篇演講中宣揚創造德意志統一的偉業而必須採取德國建立為世界強權的政策的眼光。（Wolfgang J. Mommsen：1980，3-8）Hannah Arendt 則認為「帝國主義」、「極權主義」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民族國家」體制、社會階級以及真正的民族主義的解體。（Hannah Arendt：1982，3）帝國主義一詞的原來涵義，按照矢內原忠雄的說法，“帝國主義原是一種政治運動的口號”¹³，這時的「帝國主義」，指的是“由本國和殖民地結合成的帝國的維持、擴張與保護關稅的政策”；而日本在一開始先是經濟上的對外擴張，而在甲午戰後，日本由於工業原料的需求，便隨著金錢的輸出國家全力也向外擴展：

擴張是一切政治的終極、永恆之目標，這是帝國主義政治的核心觀念；他既不是瞬間即逝的擄掠，也不意蘊著長期童話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在政治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舞台上，它是一則嶄新的觀念。（Hannah Arendt：1982，5）

¹³ 原為自由主義者—政治家迪斯累里，於 1872 年在倫敦水晶宮的演說。在演說中，作為扭轉即將來臨的大選局面的新政治綱領，他轉而主張帝國的維持和帝國的聯合。此段引自矢內原忠雄《關於超帝國主義》，《載帝國主義研究》，井上清 著、宿久高等，1986：13。

在一八六八年打倒德川幕府後建立的明治天皇政權，從一開始就是極富侵略性的，早再天皇政權將當時的反對派以武力鎮壓以後，在同年底，政府部門便制定了侵略朝鮮的計畫¹⁴，當時的天皇政府也對征韓的意向表示同意，主張征韓的人士如木戶、岩倉等和天皇政府意氣相投，一八九五年，日本海軍對朝鮮江華島的砲台進行非法挑釁，使之開炮，並以問“罪”為由準備戰爭，恐嚇朝鮮政府。一八七六年，迫使朝鮮在最初的日朝修好條規上簽字，但此後的數年間，由於日本政府一再地對朝鮮實行經濟侵略，朝鮮人民對日本的不滿情緒漸次升高，一八八二年，朝鮮爆發了兵變（壬午兵變）襲擊日本公使館，更讓日本找到了侵韓的正當理由，朝鮮成為當時清國與日本權力競逐的犧牲品，一八八九年，日本更以與清國交戰為目標進行軍備擴張，發動了甲午戰爭。

一、明治天皇及學者對帝國主義的推崇

分析天皇政權誕生以來，自一八六八～一八七一年的木戶、岩倉政府時期，一八七二年～一八七三年的西鄉、板垣政府時期，其後的以大久保利通為最高實權人物的政府時期以及繼任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掌握領導權的政府時期，除了屢次因反對派的議論而企圖將輿論的注意力轉向出征國外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之外；在國家權力上，天皇制官僚、軍人對封建領主階級所固有的領土侵占慾望，在經濟上，連同資本的原始積累而獲取金銀財寶與殖民地的慾望相互交織，緊密結合。也因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各國一直侵略東洋，日本受其壓迫卻無法向歐美各國反擊，只有透過侵略弱小鄰國來找回長久以來受歐美壓迫的損失與尊嚴。（井上清：1986，7）而以侵略鄰國來補償關於屈服歐美損失的主要基調，成為明治政府的對外政策。

而在學術風氣方面亦然，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一年）陸續刊載出許多介紹帝國主義的文章¹⁵，這時的日本和歐洲一樣，十分流行對帝國主義的美化。一般人對帝國主義的理解是：帝國主義就是將殖民地牢固地同本國相結合的主義，是謀求擴張殖民地和屬地的主義；更通俗的是認為擴張主義和侵略主義相同。倡導民權運動但失敗的思想學者德富蘇峰，曾在他的著作中《將來之日本》，極力主張將

¹⁴ 1868年12月14日參議木戶孝允向當時岩倉提出“征韓”他在日記中寫道：「至關緊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確定天下方向，二望朝鮮派遣使節，責其無禮，若其不服，則興問罪之師，已伸張神州之威。……」

¹⁵ 1889年（明治32年）3月《太陽》雜誌上登載高山樗牛的論文《帝國主義與殖民》，該雜誌同年7月“政治界”欄裏的《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以及同年10月的高山樗牛的《時勢與詩人》。

來的日本應是“和平主義的商業國”以及“生產的平民社會”，他也堅決反對軍備擴張和侵略主義，他的主張給了當時的青年極大影響；但甲午戰爭末期，蘇峰發表了《大日本膨脹論》一書，卻是為文讚美日本的擴張，更是極力煽動戰爭熱潮，此後，他更是經常充當統治階級中鼓吹擴張主義、極端帝國主義的學者代表。曾經因他的和平主義理論支持他的人都大感驚訝，紛紛抨擊蘇峰的“變節”，但德富蘇峰卻認為這是他「順應世界潮流大勢」而合理的思想轉變。

學者高山樗牛在其論文《帝國主義與殖民》中說：「歷史研究使吾人斷言如下曰：「凡實行帝國主義，不同時進行擴張領土和殖民地的國家，它必然滅亡。」他並解釋帝國主義的定義就是征服、統治、控制和剝削他民族，捨此則必亡國，這就是日本初期最為露骨的帝國主義者所直言不諱下的定義。除樗牛之外還有高山早苗，他甚至將帝國主義美化成民族國家不可避免的進程、「不應將資源白白掌握於劣等種族手中」所以侵略是等同開發劣等民族……帝國主義被視為「正當化」的開發弱小國家的的理論。而繼高山樗牛之後，對帝國主義加以倫理化和正當化的學者便是浮田和民。浮田和民企圖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現象來對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針對天皇制官僚政治家的國家學說的改進政治學說。浮田發表了六十多篇論文，用各種說法論述帝國主義如何正當，如何富有倫理性云云，以及怎樣使之正當化、倫理化¹⁶。浮田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他認為：“在國外扶植本國勢力，這種一般意識上的帝國主義，無論從歷史趨勢方面考慮，還是從倫理道德方面考慮，今天……為了自衛，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也認為日本繼歐美之後走向資本主義，在做為經濟帝國主義上缺乏實力的情況下，積極尋求和鼓吹近代帝國主義競爭是最安全的前進道路。

德富蘇峰、高山樗牛、浮田和民這三個日本帝國主義形成時期的大宣傳家，雖然立論方法、世界觀不同，卻都以蘇峰的“民友社”和新興資產階級大橋新太郎的“博文館”為發表其理論的場域。從“實力之福音”、天皇主義的“日本主義”、資產階級利益三個方面組成了日本式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以《太陽》、《國民之友》為首的雜誌，幾乎每期都登在者些評論家所寫的“政治擴張合理論”，不論是「瓜分中國論」、「領土擴張論」抑或是浮田論述的「殖民論」

¹⁶ 浮田關於帝國主義論的主要論著，可以在《倫理帝國主義》（1909）中找到。這本書其中收集了1910年由德富蘇峰的民友社出版的《帝國主義與教育》，以及自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期間發表在《太陽》、《國民之友》、《丁酉倫理講演集》和教育雜誌上的論文共六十餘篇。

文章，對日本國民進行帝國主義教育。帝國主義思想就這樣的透過報刊、雜誌和學校教育——深入且廣泛的灌輸到日本人民的思想中。

二、日本帝國主義政權下產生的矛盾

霍布遜曾對帝國主義的弊病提出三點論述，這三點分別是：對弱小民族的專制統治及迫害、造成國內政治的反動傾向、「寄生主義」的特質；其中「寄生主義」特質在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狀況並不顯著，茲就其他兩點論述與日本帝國主義狀況做出對照：

(1) 對弱小民族的專制統治及迫害

鼓吹帝國主義的論者都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物競天擇說作為其行為辯護的論點，而此點在日本鼓吹帝國主義學著德富蘇峰及高山樗牛的論述中也可得見；但霍布遜指出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過程中，大多數都對原住民族進行殘忍虐殺的戰爭，而且屬地的人民並沒有公民自由權，政治權利甚至是人民財產都被帝國侵略者所獨占。

(2) 造成國內政治的反動傾向

由於大托拉斯企業及於推動政府對外施行帝國主義政策，其加速對政府部門的控制以及打壓國內人民對和平的需求的情況乃日益加深。在這種情況下，不啻使國內的政治氣氛趨向反動。日本帝國主義是天皇政體與國內的資本家及大財閥共同建立的，地主和城市資本對農民和勞工實行經濟上的壓迫，使得農民和勞工幾乎貧無立錐之地，生活壓迫的苦痛無以言喻；這時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社會主義思潮給飽受資本主義摧殘之苦的人民帶來新的希望，人民厭惡帝國主義耗費國家資本所帶來的生活困境，國內也開始有鼓吹社會主義思想的政治團體出現，使得政治氣氛開始有趨向反動之勢。

而學者井上清認為帝國主義有四大矛盾：

- (1) 該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全體人民同以壟斷資本家為司令部的統治、剝削階級間的矛盾對立；
- (2) 同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矛盾對立；
- (3) 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對立，在俄國革命之後又再度產生；
- (4) 同社會主義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矛盾對立。

而日本帝國主義確立後的歷史，也就是這由這四大矛盾所展開、激化的歷史。建

立外表看似強大的帝國主義，但日本在經濟上及政治結構卻隱含著弱點。當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而且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受到震撼的階段上建立起來的，這無疑是對不穩定的日本帝國經濟體制的一個衝擊，日本確立了他的經濟基礎—壟斷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卻也在帝國主義本身必然產生的世界大戰中遭受沉重的打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並存且日益發展，社會主義讓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工人階級群起為反對帝國主義而鬥爭。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是深刻的。

再者為保持軍事力量的優勢，及企圖以強大的軍事侵略轉移經濟上的疲弱，日本常保持對經濟利益來說負擔過重的軍備，因此在資本積累上受到軍費的妨礙，轉而對民眾進行掠奪及壓制，國內市場的發展步調變慢，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這樣的惡性循環是一再地擴大；惡性循環下因而對台灣、朝鮮及滿洲等殖民地實行軍事、警察鎮壓，進行「只索取不給予」的掠奪，這樣必然加劇這些被侵略民族的反抗鬥爭，對於殖民地反抗運動的鎮壓，也讓日本瀕臨崩潰的帝國體制更為千瘡百孔。

第三節 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勃興

歐洲文化早在鎌倉時期末葉就已陸續傳入日本，至德川幕府時代末期，透過荷蘭人的居中引介，對於西方文化較有深廣的接觸，此時傳入的西學，即為日本史上所稱的「蘭學」，但其涵蓋的範圍多以自然科技為主，關於法政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並不多。明治維新後，日本改採門戶開放政策，歐美文化的各方知識風靡了日本整個思想界，對於日本文化、政治及社會亦產生很深遠的影響，舊政治學說方面，依其內容及主張區分，大致可歸納為四大類，即：

- (1) 法國的自由啟蒙思想。
- (2) 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
- (3) 美國的基督教派思想。
- (4) 德國的國權思想。（陳水逢，1967：281）

上述四派思想主張，除了來自德國的國權思想在日後發展為日本國粹主義及君權至上的支柱，其餘三派都是鼓吹自由民權及闡發自由平等的博愛精神，而這些思

想均非來自日本傳統的產物，經由信仰者的倡導鼓吹，一班民眾逐漸體認到個人權益的維護及重要性，再加上甲午戰爭後，日本產業資本迅速確立，傳統農業體制遭受崩壞，獨占產業的地主及資本家又極壓榨一般勞苦民眾的生活，物價飛漲，農工生活困苦卻又無法求得溫飽，社會流弊逐漸顯現，此時醉心於社會公道的先驅者便起而提倡社會主義思想，對當時的資產階級及帝國心態的政府提出猛烈的抨擊，而社會主義運動亦隨之萌芽、茁壯。

一、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時期

(一) 社會主義團體、黨派的相繼成立

1. 社會主義思想的勃興

社會主義最先傳入日本約在一八八二年（明治 15 年）。宍戶義知曾把伍爾塞(Woolsey)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Communism and Socialism in their History and Theory*) 的第一冊譯成日文，名為《古今社會黨沿革略》。而由基督教徒所創辦的《六合雜誌》更於其中一期論及馬克思思想¹⁷，但除了在《六合雜誌》偶而出現外，從此一直到一八九三年（明治 26 年），馬克思這個名詞在日本就不再出現過。一八九三年，德富蘇峰所主持的「國民之友社」（簡稱民友社）出版了一本論述社會主義的著作《現時之社會主義》，德富蘇峰在當時是主張平民主義的政論家，對社會問題一直都很關心及同情，他雖不贊成社會主義，但他認為應對社會主義所含蘊的事實、感情、精神與潮流都應有所了解、探究，才編纂此書。依其序言，此書是根據威廉·葛拉漢的《新舊社會主義》(William Graham: *Socialism, New and Old*, 1890) 和約翰·李的《當代社會主義》(John Rae: *Contemporary Socialism*, 1884) 論述社會主義各派的主張，書中曾簡要說明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出書之後頗為暢銷，在介紹社會主義方面居功厥偉。同年，由德國回國的博士草鹿丁卯次郎也在《國家學會雜誌》上發表〈卡爾·馬克思〉，簡介馬克思之後，即指出「馬克思專攻哲學與經濟學；哲學得自黑格爾，經濟學方面則自創新說。」，接著介紹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當時日本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相當有限，大抵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放在解

¹⁷ 《六合雜誌》創刊於 1880 年（明治 13 年），由當時在日本的基督教徒所創辦，創刊翌年（1881 年）由小崎弘道執筆在第七號上撰寫〈論近世社會黨之原因〉，文中提到馬克思：「從前社會黨領袖卡爾·馬克思所論觀之，目前社會貧富懸隔的原因乃緣於所有權之法。所有權之法乃竊盜之法，資本家獨占不當之利益，工人不能獲得相當的報酬；拯救之道只有廢除所有權之法，重新組織社會法。」（李永熾，1989）

決社會問題的層面上而已。

而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政黨方面，東洋社會黨是第一個以揭示社會主義為號召的社團¹⁸。東洋社會黨所揭櫫的綱領，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先驅者幸德秋水認為該黨主張所蘊涵的以道德為言行準則的依據及高倡平等主義，已頗具有無政府主義的氣息（下出隼吉，1929：337-338）。但經由深入的探討分析可以發現，東洋社會黨的主張曾觸及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巴枯寧（Michael Bakunin）及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人的思想及主張。而其所秉持的人道精神、高揚平等觀和人權觀，則與民權論者頗為類似，東洋社會黨綱領所流露的三大信念，即：道德、仁愛及平等。這種基於互助合作、和平友愛氣氛下的社會主義政黨，與基督教存有不可忽視的密切關係。但東洋社會黨的成立，實開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型態鼓吹之首。

2. 社會民主黨的成立過程

（1）勞動問題研究會

由於當時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致使許多人對於資本主義競爭下所呈現的不公平，產生強烈的不滿，此股怨忿之情隨著社會階級對立加深而日趨嚴重，導致社會主義思想因而慢慢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1897年（明治30年）6月25日，一群日本社會主義信仰者於日本東京神田區美士代町的基督教青年會召開「勞動問題演說會」，是為日本首次以討論勞動問題為核心的會議。在會中，片山潛以「勞動者團結的必要」為題，發表演講，闡釋勞動階層團結爭取權力的必要。參與大會群眾數目高達一千二百人，會中更提議成立「勞動組合期成會」。第一次月會於同年八月召開，選出片山潛、澤田半之助、高野房太郎、松村民太郎、山田菊三等為幹事。實際會務則由片山潛一手操縱。

（2）社會民主黨

同一時刻另一社會主義團體「社會主義研究會」亦於明治31年10月召開成立大會。參與者有片山潛、幸德秋水、安部磯雄、河上肇及村井至知等人，上述諸人除幸德秋水外，均與基督教派有密切的聯繫。社會主義研究會明揭其宗旨

¹⁸ 東洋社會黨在樽井藤吉、赤松泰助的鼓吹下，成立於明治15年（1882年）5月25日，其成立基本綱領有三：1.該黨言行恪遵道德原則；2.主張平等主義；3.以追求社會公眾之最大福利為目的。該黨主張經由遊說、演說及發行刊物等和平方式達成社會主義的理想，反對用暴力行為達成目標。

為「研究社會主義原理是否得以行之日本」為主。安部磯雄則創設「六合雜誌」，作為該會的機關報。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不久又更名為社會主義協會，於 1901 年 5 月 20 日改組成立社會民主黨，以政黨形式於日本推展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創始者為：片山潛、幸德秋水、河上肇、安部磯雄、木下尚江及西川光次等六人。幸德秋水並將該黨宣言登載於「萬朝報」。宣言書內容可分為「理想綱領」及「行動綱領」兩大部分。「理想綱領」主要是倡導人種及萬國的和諧平等，生產機關、土地及交通設施均應屬公有。亦主張財富均等、政權人民共享、人民皆有受教育之權，並且痛斥富者壓迫貧者，主張以社會主義及平民主義打破貧富懸殊，進而求世界和平。至於「行動綱領」則主張廢除死刑、治安警察法、貴族院、星期日工作及新聞管制等。另亦主張獨占事業公有及實行全面普選。此宣言書中所流露出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精神是本之於「自由」、「平等」，實踐方式則主張漸進策略，亦可反映出社會民主黨所秉持政治理念的特色，大致可歸納成四部份：其一是該宣言內容具有濃烈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色彩；其二為宣言中所倡議的「理想綱領」部分可歸諸於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切實際；其三是宣言裡孱入濃郁的自由民權思想；其四是部份條文已明確具備了社會主義的精神。

（二）紛雜的勞、農運動與抗爭

明治執政時期為了迅速超越歐美列強，不但加以改造軍事工業，一方面也繼續發展傳統的棉紡、絲織、造紙和製糖等輕工業，明治 10 年開始，工業發展由都市發展到地方。明治 20 年起，地方的手工業逐漸被近代工業所取代。甲午戰爭後，近代工業產品瓦解了農村的手工業生產，促成農民階層的兩極分解，農民階層分解為富裕的地主階級和貧窮或無產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有的舉家遷入都市，成為資本制生產的工人；有的則以「出稼」（農閒時到都市打工）的形式，提供工業的生產力。

1. 工業發展下的社會問題及階級抗爭

（1）童工、女工佔多數

在快速的工業發展下，形成此時期工人階層的一種特別現象—女工、童工成為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也是當時工廠的「主要」的勞動力。特別在紡織產業中更是廣泛的使用沒有受過教育而且幼弱的女工及童工。據統計，1872 年，日本民間工廠男女工人的比例為 3：7，紡織纖維工廠為 1：9（米慶餘，1988：

25) 到了 1894 年，女工仍佔工廠工人總數的 62.7% ，如阪神地區的火柴工廠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 10 至 15 歲的兒童，其中還有 6 至 8 歲的兒童，在紡織工廠的精紡車間，也可以看到 7 至 8 歲的童工。（橫山源之助，1958：139、159）日本政府在 1897 年的調查也不得不承認，紡織工廠表面規定徵僱用女工必須在 12 至 13 歲以上，但實際常常使用 7 至 8 歲的童工，而這種不滿 14 歲的童工比例，到 1914 年還戰工人總數的 5% 。女工、童工佔多數是日本早期工人階級的一大特點。

（2）勞動環境惡劣

當時的男、女工人勞動時間超時，但所得的薪酬卻入不敷出，只好從事其他副業來負擔家計¹⁹，但勞動的環境條件卻非常惡劣。當時農村流出的女工都住在集體宿舍，據細井和喜藏《女工哀史》（1925）說，女工宿舍就像「豬舍」²⁰，可以顯見資本家是如何極盡苛刻的對待勞工。而且在廉價工資和長時間勞動的惡劣條件下，男工長年發病，或因營養不良而引發腳氣病，又因疾病而失去工作導致家庭破滅。而當時的勞工都早衰短命，到四十歲前後已不堪從事體力勞動。女工更為淒慘，據《萬朝報》（1901）報導，在被稱為模範工廠的鐘淵紡紗公司，三千多名女工中接連出現結核肺病患者，警視廳調查後說，「其因全在於女工待遇苛虐、工廠設備不完全」、「幾乎比監獄囚犯的待遇還遠為不如」。「結核女工」也成為紡紗女工的異稱。

2. 勞工運動的興起與衰退

（1）勞、農爆發抗爭

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必然引起農、工無產階級強烈的反抗。早在明治政權初期，高島煤礦工人就於 1870、1872、1880、1882 連續發生“暴動”。

（山崎五郎，1965：21）。1886 年山梨縣甲府繅絲女工為爭取提高工資、改善

¹⁹ 據橫山源之助《日本下層社會》（1899）說：「規定的勞動時間雖是十小時或十一小時，但都加夜班到九點鐘，甚至每個月有五、六次加夜班到十二點鐘」。但工人卻只能得到日新三十錢或四十錢、五十錢。一個月的工作日數二十五天，則月入最多十二圓五十錢。依一家三口的生活費計算，房租四圓、米七圓六十錢、薪炭二圓五十錢、蔬菜一圓五十錢、菜餚一圓六十錢、酒（五升）一圓、味增醬油五十錢、煤油十九錢、理髮三十五錢、孩子零用錢一圓，總共二十圓五十錢，其他娛樂費、教育費不算在內，月入已不敷八圓，因此家人必須再從事其他副業來彌補家計。

²⁰ 宿舍為防止女工逃亡，四周環以圍牆，牆上佈滿竹槍、玻璃碎片、鐵絲網等；圍牆外是漾著水的壕溝，整個看來有如「奴隸島」。屋內，每人只能分到一個榻榻米，蓋「煎餅蒲團」（薄而小的棉被）而睡。而當時採取晝夜輪班制，做完夜班的人較起晝班的人，自己再鑽進被窩睡覺，等於兩個人共用一個榻榻米。食物則以下等米為主，配上一些醃菜、醃魚之類的，菜量只有一班家庭的三分之一，其狀「簡直比布爾喬亞養的狗都還不如」。

勞動條件，舉行了在日本頗有影響的工人罷工。日共工人運動的領袖片山潛說：「在日本，近代的工人運動，可以說是從 1897 年的夏天，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才開始的」。（片山潛著、王雨等譯，1959：239）

甲午戰爭後，勞資衝突、工人罷工事件不斷發生，且規模越來越大²¹。這些鬥爭帶有很大的自發性，雖然參加人數不多，又是以提高勞動條件改善和提高經濟待遇所進行的鬥爭，但是在鬥爭的過程中已經展現了所謂無產階級抗爭的精神。而在勞農抗爭的過程中，爆發了著名的抗爭事件：

足尾礦毒事件：

近代工業發展帶給日本的就是礦毒問題，從足尾礦毒事件²²就可見一斑。梶木縣要求縣政府消除礦毒之害，國會議員田中正造自第二屆議會以來，一直要求政府救濟被害農民並命令公司安裝防礦毒設備，但田中所屬的政黨對農民的要求不予理會，完全偏袒資本家古河士兵衛。明治 29 年（1896 年）因渡良瀨川發生洪水外溢，受害民眾多達十萬人，民眾乃向農商務大臣榎本武揚要求關閉足尾銅礦，1897 年 3 月開始，於 1898 年 3 月、9 月、1900 年 2 月份四次，派各村代表數千人赴東京示威，但都遭到了警官隊和憲兵隊的鎮壓，不少人受重傷，在第四次，有三十多人被加以“凶徒聚眾滋事罪”被捕下獄。農民的這場鬥爭感動了社會許多人，最後伊藤博文內閣只得設立足尾銅山礦毒委員會，進行調查。而農商務大臣榎本也因此辭職。

米騷動：

1918 年爆發的“米騷動”²³是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抗爭，雖然最初

²¹ 據日本官方統計，1897 年下半年有 32 次（平均每次 110 人），1898 年有 43 次（平均每次 146 人），1899 年有 15 次（平均每次 286 人），1900 年有 11 次（平均每次 219 人）。有日本學者則指出，此數字是大大縮小的了。另根據青木虹二的統計，1897 年為 116 次（19572 人），1898 年為 58 次（9711 人），1899 年為 37 次，1900 年為 39 次。

²² 足尾礦山是明治 10 年（1877 年）古河士兵衛承購政府產業後開始經營的。當時產銅量大約七萬七千斤；明治 20 年（1886 年）五百多萬斤。明治 25 年增至一千多萬斤。產量越多，礦毒之害越大。礦水流入渡良瀨川，經關東平原北部、梶木、群馬兩縣，入利根川。渡良瀨川本來水質甚佳，魚產量豐，有三千漁民靠此維生。明治 10 年，因礦水關係，魚產量已銳減；礦水更流入稻田，到明治 23 年（1890 年），大雨致洪，渡良瀨川兩岸幾成不毛之地，礦山附近也因礦煙污染因而幾乎變成禿山。

²³ 由於日本不斷的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使得諸如大米等群眾必需生活品極缺，造成物價飛漲。三警等特權資本和商人在政府下令大量收購軍糧，使本來就物價飛漲的糧價更加暴漲。1918 年 7 月 23 日，富山縣漁民婦女要求停止外運糧食、降低糧價，卻遭到警察鎮壓。以此為導火線，要求救濟窮人的群眾運動在該縣所屬各地擴展開來，並日趨激烈。從 8 月 10 日至 16 日，在東京、名古屋、大阪、神戶、京都、橫濱幾乎所有大中城市裡，都發生了數千人至數萬人、十幾萬人的民眾大起義。他們在搗毀囤積居奇的米店和高利貸的同時，甚至無所畏懼和警察或軍隊發生衝

是由漁民開始發動，但後來廣大的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等也都參與其中。片山潛指出，在參加這次大騷動的群眾中，工人占 90%，“米騷動給日本工人運動以強有力的刺激，把他置於革命的軌道之上”（片山潛，1960：330）

儘管米騷動沒有政治領導勢力，但其政治收穫卻是巨大的：

第一：米騷動不僅使寺內內閣不得不辭職，而且使原敬的政友會內閣在其後得以成立，這時天皇政府以認知到官僚內閣是行不通的，必須讓掌握民眾的政黨來組織政府，而這帶有日本式局限性的政黨內閣也是由於米騷動的力量才得以成立的。

第二：米騷動大大加強並普及了民主主義思想。經濟學者福田德三論述米騷動時，便認為當時的人生活都已陷入極度貧困，當然會爭取優於一切的“生存權”；且一般民眾已對軍國主義的行動感到極度厭倦，就算騷動發生後天皇“御賜”了“撫恤金”，人民也並不感謝其恩惠，反認為自己有權要求使生活安定的政治。（井上清，1986：299）

第三：最重要的是，人民大眾一方面認清了軍隊、警察的本質，一方面覺悟到大眾行動的實力，而這一點也是政府、資本家、地主最感到害怕的。騷動後擔任首相的原敬在日記（1918年11月3日）中嘆道：「人民不知何時沾染外國空氣……社會主義之傳播今驟然成為對其無計可施之勢。」這種民眾的覺悟後來成為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部落民運動、婦女運動及其他一切社會運動和人民運動的動力。

（2）勞工運動的興起推手

勞動組合、工會組成：

由於日本當時工農受壓迫的情況已相當嚴重，明治 23 年（1890 年），城常太郎、澤田半之助及高野房太郎等人，因早已在美國接觸到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實際情況，在美國舊金山建立了“職工義友會”，為解決日本勞工問題預先作準備，未幾，他們歸國並認為日本工人運動的時機已經成熟；明治 30 年（1897 年）4 月在東京創立了“職工義友會”，把題為《論職工諸君》的小冊子廣泛分發到各個工廠，直接號召工人階級起來組織工會的必要性。而後片山潛、鈴木純一郎、佐久間貞一、島田三郎等知識份子陸續加入“職工義友會”，這便是「勞動組合期成會」的前身。勞動組合發行的半月刊《勞動世界》標舉「勞動神聖」、

突。接著從 16 日開始擴展到小鎮和各村，在山口縣的宇部煤礦和九州的十幾個煤礦，手持炸藥的礦工們同軍隊發生對抗，一直到九月上旬才逐漸平息，而當時的寺內內閣也因此引咎辭職。

「組合就是力量」為口號。創刊號中社論說到：「《勞動世界》的方針乃在於改良社會，而非革命；對資本家非以分裂鬥爭為事，乃在維護真正的協調。」高野房太郎也以國內市場論為依據，主張高工資才能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片山潛則強調，組合是勞資疏通意志的機構，有此組合，同盟罷工才會消失。論點雖有不同，但都以改良社會為目標，認為組合可以提高勞工的生產性，「使日本的工商業益加興隆」。可見勞動組合的宗旨相當溫和，並無與資本家對立鬥爭之意；而日本學者井上清也認為發起勞動組合領導人，未必是真正憐憫當時工人痛苦的處境²⁴，在他們的心態，只是認為發起工人運動對促進資本生產是有益的。（井上清，1986：108）

明治 30 年 7 月 5 日創立了“工會促成會”（會員 71 名）。12 月 1 日，以促成會為基礎，又組成了以機械工人為中心的“鐵工工會”（會員 1,880 名），創刊了工人運動的機關報《勞動世界》（半月刊），由片山潛擔任主筆。隔年 4 月，日本東北線列車發起“改善待遇同盟罷工”，在其中產生了“日本鐵道矯正會”；至 8 月 4 日，又組成了“活版工組合”（會員 350 名）等……。總計從 1897 年到 1899 年，相繼組成了近代的工會，對於當時戰時和戰後的增加稅捐、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超時勞動等問題，工會都適時進行抗爭，而且由於在抗爭中多次由工人階級取得勝利，工人的自我意識更迅速得到了提升。

這時期勞動組合的共同特色是：〈1〉強調勞資協調。雖然組合間有比較傾向協調的，如活版工組合，也有較具戰鬥性的，但仍以勞資協調為基本理念。〈2〉消除組合成員自身的弊端。重視「溫厚、篤實、品行方正」，以提高工人社會地位為目標。〈3〉具有互助的性質，如生病、受傷或死亡都支以救助金。在這三種特色中，組合成員最重視的是互助活動，卻也因此種下了勞工運動衰退的原因。（李永熾，1987：84）

（3）工會組織面臨的內外壓力

從明治 33 年（1900 年）9 月，勞工運動已趨於瓦解。其原因有二，一是內部問題；二是外在壓力，試加以分析如下：

²⁴ 日本學者井上清認為當時勞動組合領導人物中的片山潛、高野房太郎等人都是民族主義者，甚至是國家主義者，他也舉出辻野功的論文《黎明期工會運動中國家主義的轉機》（《同志法學社》第 87 號）中說到的：高野稱自己在日本掀起工人運動的理由，並非出自對工人境況的憐憫和人道主義的同情，“我之所以主張此點，是因為他對國家將來的繁榮是必要的，對將來文明化是不可缺少的”；農商務次官金子堅太郎也曾在對工人的演說中，以日鐵罷工為例闡述工人團結的數量，他說：“加強職工團體就是加強一國的基礎，故絕非僅僅是職工的事”。

內在問題一

會費開銷捉襟見肘

如上所述，勞動組合最重要的活動是互助，而許多勞工爲了這個宗旨入會。自明治 32 年起入會人數逐漸增加，這時因溽暑而致病的組合員爲數甚多，互助金的支出增加只好相對節省支部的費用，但支部財務仍是赤字連綿，最後只得刪減救助金額，組合員也不願再繳會費。

資方以溫情施壓

勞動組合強調勞資協調，但資本家團體也是明顯的予以敵視，就連取得資本家團體的諒解而寫入工會規章的“夜班增薪二成”的條款也被迫作廢。（隅谷三喜男，1963）資方爲維護自己的權益，最常用的施壓方法是解雇與差別待遇。所謂差別待遇是在工資上只給非組合員加薪，組合既然不能發揮作用，工人自然認爲不參加組合才是於己有利。

外在壓力一

治安警察法的實施

勞動組合面臨的外在壓力是 1900 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政府及資本家企圖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初期就予以扼殺。1900 年 3 月，政府與議會沒經過審慎的討論便通過了“治安警察法”，該法同 1890 年的“集會及政社法”，以及上溯到 1880 年的“集會條例”是一脈相承的。第一，所有政治結社及政治集會視同非政治性結社及集會一起被置於警察關的任意取締下，授予內務大臣禁止結社權、授予警察官解散集會權。第二，禁止官公吏、軍人、教員、大中小學生、未成年者及婦女加入政治結社、參加政治集會或充當其發行人。

「治安警察法」也可說是帝國主義者危機感的產物，當時政府傾全力擴張軍備，他們也害怕一旦鐵工廠發生罷工，國家的軍隊將蒙受極大的損失²⁵。工會運動儘管因治安警察法的通過而受到了一時的挫折，但砲兵工廠和日本鐵路大宮工廠鐵工協會會員們這些先進工人，支持片山潛、幸德秋水、安部磯雄、堺利彥等

²⁵ 當時內務次官有松向眾議院委員會進行有關當時鐵路罷工事件的說明時，曾說道：「凡屬大工業、礦山、船舶運輸的工潮，既損害公司，又損害社會，特別是一但供應軍需品的製造者遇到同盟罷工，將給戰役造成很大影響。比如，如果砲兵工廠的工人在戰爭中進行了罷工，則我國軍隊將蒙受極大的不利。而且，從國家經濟方面來說，也將帶來非同小可的損失，不僅如此，還將對貿易及其他關係產生巨大的障礙」

社會主義者，促使他們於 1901 年 5 月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雖然該黨一創立就被治安警察法禁止結社，但社會主義運動並沒有衰退，而且工人運動真正站到階級立場上，為擺脫勞資協調主義作了思想準備。

二、反戰運動的展開與社會主義

（一）強烈反對對俄開戰

就在勞工運動激進化，社會主義運動日益活躍之時，日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戰爭都隨時可能爆發，社會主義運動也走上反戰之途，明治 36 年（1903 年）戰爭似乎已無可避免，日俄戰爭的爆發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路線的轉捩點。戰爭發生的背景因素主義主要是導源於中日甲午戰爭，發生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俄兩國在爭奪中國東北權益上日趨白熱化。日本國內民情對於俄國於東北亞肆意擴張，尤為激憤，力主對俄宣戰。

反戰團體內村鑑三、幸德秋水²⁶、堺利彥、河上肇、斯波免吉、石川三四郎領導下，四處奔走呼號，鼓吹反戰。至於當時的反戰團體大致可歸納為三派：

- （1）從人道主義立場反戰，以萬朝報社長黑岩淚香為領導。
- （2）基於社會主義立場反戰，以幸德秋水、堺利彥等人為領袖。
- （3）根據基督教原則反戰，以內村鑑三等人為代表。

其中萬朝報社長黑岩淚香原本是持反戰論調最激烈的人士，但日俄戰爭無可避免時，他認為繼續堅持反戰也沒有意義，乃轉向主戰論。當時擔任萬朝報記者職務的幸德秋水、堺利彥即脫離萬朝報社，理由是「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說，國際戰爭部外是貴族與軍人的私鬥，卻以多數國民作他們的犧牲品」。將社會主義和反戰論結合起來，幸德秋水根據此論點創辦「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作為反戰論的中心；社會主義協會也移到平民社。平民社遂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中心，提出「平民主義、社會主義及和平主義」三項口號，否決「訴諸武力以獲

²⁶幸德秋水（1871-1911）就是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家和先驅人物之一。幸德秋水，本名傳次郎，生於日本高知縣。他從青少年時代起便投身自由民權運動，曾拜自由民權運動的著名理論家中江兆民（1847-1901）為師，深受其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後來他從事新聞活動，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並通過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理論之後，逐步成長為一位社會主義者。這個時期他組織過社會主義研究會（1898 年）和社會主義協會（1900 年）、創立過社會民主黨（1901 年）；日俄戰爭時期，他毅然投身於反帝反戰鬥爭。不久，又與堺利彥（1870-1933）合譯和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日譯本（1904 年），並著書立說，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思想。1905 年後，在統治階級殘酷鎮壓面前，幸德秋水對國家機器滿懷仇恨，加上受到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便逐漸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1911 年他在日本統治階級制遭到的所謂「大逆事件」中被處死刑，不幸離開人世。

一時之快」的手段，決定在「國法允許的範圍內」尋求實現之道²⁷。

平民社創立宗旨導因於為抗議日俄戰爭的爆發，因此該社於明治 36 年 10 月 20 日召開第一次反戰演說大會。演說會首先由西川光次郎主講「トルストイの戦争論」（托爾斯泰的戰爭論），其次為安部磯雄的「利害論と社會主義」及木下尚江的「吾人は戦争の義務ありや」，演講內容部分是基於人道主義精神而萌生對人類關懷之情，主要仍以抨擊戰爭為重心，他們一致認為戰爭的發生係專制帝王及資本家利益衝突所致。

然而平民社由於財政困窘及成員間政治信仰產生分歧，在明治 38 年（1905 年）宣告解散，發行社刊《平民新聞》也因不斷受到彈壓，禁止發行，日本社會主義遂逐漸轉向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之途。

（二）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

日本學者荒畑寒村研究日本初期社會主義運動的特色，認為其所展現的歷史意義是少數先驅者所呈現的矛盾、不徹底、謬誤及混淆不清的現象，可以明治 36 年發表的「平民社宣言」內容作此觀察，當時社會主義主流派明顯受到德意志民主社會黨議會政治所影響，主流者的信念、主張及實行方法上，並未滲入虛無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色彩。雖然在 1904 年以前曾出版過幾本討論俄國虛無黨籍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如下

:

表 2-4 日本無政府主義書籍介紹

²⁷ 平民社在其發行週刊《平民新聞》創刊號中，明白揭示「平民社宣言」，其中首揭自由、平等、博愛三大要義；其次主張打破門閥、財產不均、男女不平及一切人爲的束縛；第三是基於平等福利的原則，主張生產、交通、分配均應歸公。第四是倡議和平主義、棄絕戰爭。第五是基於自由、平等、博愛三原則，於國法許可範圍內行事，絕不採取暴力行爲。出自中村英雄：1930，48。

著（譯）者	書名	出版時間
西川通徹	露國虛無黨事情	1882
杉山若太郎	魯國奇聞烈女之疑獄	1882
川島忠之助	虛無黨退治奇談	1882
宮崎夢柳	鬼啾啾	1884
煙山專太郎	近世無政府主義	1902
原抱一庵	無政府黨之一夜	1902
塚原澀柿園	虛無黨	1904
松居松葉	虛無黨	1904

資料來源：引自洪德先，〈近代日本社會主義之興起及其對中國之影響〉，《銘傳學報》第 27 卷，頁 80。

雖然這些書籍對無政府主義作了概念性的介紹，但影響力卻極其有限，至於 1902 年出版的煙山專太郎所著的「近世無政府主義」一書，對於中日兩國激進份子影響頗大。該書並不是一本僅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書刊，書中曾大篇幅地介紹俄國虛無黨人的活動，且極力鼓吹暗殺主義，更詳盡地解說如何組織暗殺團，進行暗殺。但對於之後的日本無政府主義之父幸德秋水，在當時並未產生影響。

幸德秋水理念轉變

平民社時期：

1904 年 2 月日俄戰爭爆發時，同年 3 月 13 日幸德於平民新聞十八號中刊載「與露國社會黨書」²⁸，但從「與露國社會黨書」中，約略可感到幸德秋水的思想已略呈改變，幸德秋水在文中痛斥兩國政府在帝國主義利益爭奪下，不顧人民痛苦發動此一戰爭，因此號召人們奮起一舉推翻專制政府，以謀人道之和平。同時在追求理想實現過程中，深感和平手段效果太差，乃主張以武力排除人道之敵。（荒畑寒村，1973：111）此時幸德秋水與其在平民社初期揭櫫「合法主義」、「道德主義」的主張，似乎已有很大的差異。後人研究認為此轉變可能是幸德在

²⁸ 文中幸德秋水要求日俄兩國社會黨同志攜手聯合消弭戰爭，這篇文章後曾被翻譯為英文，於歐美發表，引起極大迴響，連俄國社會黨機關報也為文與之呼應

引述俄國虛無黨歷史時，受到俄國虛無主義思想所影響，亦為日後幸德秋水的思想變遷潛伏下一個誘因。貝馬丁（Martain Bernal）認為俄國虛無黨的活動對日本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就如同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對法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啟蒙效果一樣。（Martain Bernal，1976：76-77）

旅美時期：

1905年7月幸德秋水出獄後，他便想到國外旅行，旅行目的有三：（1）學習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國際聯合運動最需要的外國語言；（2）訪問外國革命黨領袖，希望能從他們的運動中學習一些東西；（3）從天皇毒手所不及的外國可以自由評述天皇及其政治組織與經濟制度。他於11月啟程赴美，在美五個月後，於1906年6月回國。在美國的這段期間，幸德深入了解美國這個大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有著與日本同樣嚴重的勞工剝削問題，由於在此期間發生了舊金山大地震，幸德覺得自己獲得了充實的無政府主義經驗²⁹。在這之後，幸德秋水便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並積極宣傳無政府主義者的「直接行動」論點，在社會黨內部造成主張議會主義者與直接行動論者的論爭。

三、社會主義流派的分歧

（一）社會主義團體的分裂

1905年幸德秋水因主編平民新聞，於第52號刊登「教育批判號」及53號刊登「共產黨宣言」，致使被日本法庭判刑五個月，在獄中的幸德對於現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經由反省而產生懷疑；而同時期平民社野因財政困窘、成員間友誼破裂及政治信仰崎異，導致平民社正式宣告解散，分為三派各自發行刊物。三派如下：

（1）成立「新紀元社」，發行「新紀元」，負責人為木下尚江、安部磯雄、石川三四郎，其立場較偏向基督教社會主義。

（2）「凡人社」，發行「光」，成員為山口孤劍、西川光次郎，其立場偏向唯物論社會主義。

（3）「社會主義研究」月刊社，負責人為堺利彥。

²⁹ 1906年4月，舊金山發生大地震級地震所引起的火災。當時商店全都關閉；郵政、鐵路和汽船全部免費；糧食每天都由救災委員會分配；糧食的運輸，傷患的收容與看護、廢墟的整理、避難所的營建都由壯丁義務擔任，即使想購物，因為沒有商品，金錢也變成無用之物。看到這些情形，幸德認為私有財產已經消滅，而且局無政府的共產狀態，覺得很有意思，認為自己獲得了很有益的實驗。

1906 年社會主義政黨「日本社會黨」成立，基督教派「基於基督教立場，反對鬥爭主義，誰也不參加日本社會黨」，可見社會主義陣營的歧見日深。出獄後赴美的幸德秋水，因接觸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又與世界工聯(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³⁰成員密切往來，回到日本後的幸德思想為之幡然轉變，不但展開了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序幕，同時掀起了社會主義思想者路線的激烈論爭。

1. 「議會政策」與「直接行動」派的對立

「直接行動」與「議會政策」路線的激辯

幸德秋水影響最大的還是他在美國與無政府主義者、流亡社會革命黨員以及跟美國世界工聯(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運動的接觸。回國後，在神田錦輝館演說時，即指出：「所謂的立憲的、和平的、合法的運動，以及投票的多數，在財力、警力之前都是無意義的。」因此極力強調直接行動論。當幸德秋水揭櫫「直接行動」的理念後，對堅信「議會主義乃革命之道」的社會黨衝擊極大，致使早成分裂的社會主義陣營、派系之間的對峙益發嚴峻。其派系區分如下：

- (1) 幸德秋水派，主張直接行動主義。
- (2) 西川光次郎派，主張精神的社會主義。
- (3) 片山潛派，主張議會主義，屬於唯物論社會主義。
- (4) 木下尚江派，屬於基督教社會主義。

當時西川及木下兩派已漸失影響力，能與幸德秋水派抗衡者，只有片山潛派。兩派各自發行刊物，為己鼓吹。「直接行動派」的森近運平在宮武外骨的資助下，創刊「大阪平民新聞」，堺利彥、幸德秋水、山口孤劍均為之執筆，倡導「革命的社會主義」、「直接行動主義」，具有濃郁的無政府主義色彩。「議會政策」派的西川光次郎、片山潛則於1907年6月2日創刊「社會新聞」，由田添鐵二主筆，強調議會路線之重要，具有濃厚改良的社會主義色彩³¹。而兩派之間也爆發激

³⁰世界工聯是1905年由不熟練工人組成的團體，也是受資本家及資本家爪牙—熟練工人的虐待的人所組成的革命組織。

³¹田添鐵二在二次大會中發表演講，他認為「社會主義決不單調，不是一條直線」，有種種方式，議會政策即其一，直接行動也是一種方式，兩者合併使用同樣是一種方式。但是，目前政權和軍權都掌握在權力階級，採取直接行動，並無意義。而且，有志於社會改革的人不能審視時事，洗一舉完成社會改革，是過分相信個人的力量或團體的力量，而視之如神，這是非科學的思想，是

烈的理論辯論。

2. 「直接行動」路線的勝利

堺利彥曾於1906年11月5日的《光》上，發表「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一文，主張兩派差異無多，應該互相協調折衷。他認為多數社會主義同志都產生和幸德秋水一樣的思想變化，而社會主義運動方針應該一方面採取議會政策，一方面謀求勞工團結，議會活動與議會外的大眾行動互相呼應，使大眾整體活動能夠活潑起來³²。二次大會時，折衷案雖然通過，但事實上可謂是幸德秋水派獲得勝利，因為幸德所主張的「直接行動」論，得以正式成為日本社會運動的主要方針之一，亦象徵日本無政府主義力量正式凌駕於馬克思主義派之上。

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動論之所以能獲得多數年輕黨員的支持³³，除了幸德本

詩的想像，是一種英雄主義，這種方式實不足取。他認為，社會黨應該先了解社會進化的歷史命運，而在趁勢前進，對勞工階級進行教育，喚起他們的階級自覺，並展開勞工階級的經濟團結運動與政治團結運動。要達這些目標，他認為採行議會政策最合理，因為「議會是日本政治組織的中樞，所以向議會發起運動最為有效，而且是勞工階級自覺的正當程序。依我所見，組成現實社會權力階級資本家制度的利害關係中心點正是議會；向他們利害關係中心點展現勞工團結的勢力，射出平民自覺的子彈，最為必要而且有效。換言之，議會政策是勞工階級對權力階級戰爭的最有力武器。」很顯然，田添鐵二是採取從社會內部改造，以逼使權力機構轉換的戰術戰略，反對不分析時局的詩性運動方式。後來，山川均回憶社會黨大會時的狀況說：「至少在過了四十年以後的今天，勞工階級雖然朗讀放棄議會政策的決議，卻反而開始領會到所謂的『議會是政治組織中樞』的意思，承認議會行動的重要性。」見《一個凡人的紀錄》，（朝日新聞社），荒畑寒村也有同樣的看法《寒村自傳》，（岩波文庫版）。

³² 堺利彥認為：「我們既然有議會這個噴火口，當然要傾力從這噴火口噴出我們的氣焰。可是，魏了掌握此一噴火口，也就是為了贏得普選，我們必須展示我們的實力，逼迫政府與政黨，也就是需要幸德君的直接行動。普選實施後，社會黨還不能選出多數議員，就需要覺醒的勞工以所謂直接行動逼迫。在進一步言，即使社會黨議員居於多數，若期後沒有平民階級的實力存在，則議員只是無根之花，不能有所作為。所以，要社會黨議員在議會內能夠活動，就需要依覺醒勞工活動展現一般平民階級的實力。……議會當然是一個噴火口，但並不是唯一的噴火口；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在議會之外另創種種噴火口」堺利彥，〈社會運動的方針〉，《平民新聞論說集》

³³ 當時日本社會黨所取範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誠如幸德秋水所言，秉持議會主義，卻沒有任何成就，使日本社會黨年輕的一代大為絕望；而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國內接連發生「日比谷燒打事件」、「反電車票價上漲事件」及「足尾礦山騷動事件」。這些民眾自主蜂起的事件讓社會黨員產生一種幻想，以為民眾已經自覺，能夠主動起來反對政府的決策，追尋自己的權益。而在內在方面，幸德秋水有他個人的性格魅力；例如在二次大會中，依堺利彥的敘述，幸德「以病體與寒風作戰，目放電光，口吐火焰，一句比一句強烈，一段比一段急切，整整一個小時，使全場人心如醉如痴。」而田添鐵二則有如學者，邏輯嚴密，層層累進。兩者相較，田添自然不易鼓起年輕人的熱情。另一方面，當時的年輕人事實上都是行動的侏儒，山川均作證說：「與幸德直接行動發生共鳴的年輕人大多未必經過與幸德同樣艱苦的思索。對於沒有跟群眾接觸，甚至連群眾運動之觀念也沒有的人來說，以直接行動作為革命手段，就像棄議會政策如敝屣一樣簡單容易。也許許許多年輕人並不是為了實踐革命，而是為使自己滿足於更革命這種要求，才左袒勢如中天的直接行動論。」荒畑寒村也在自傳中說：「如果山川均如此，我也是『滿足於自己更革命的典型年輕人之一』。」

身散發的性格魅力令人懾服之外，議會政策本身無法在當時發揮成就，令日本社會黨年輕的一代大感失望。（李永熾，1989：27）雖然後人在評論幸德秋水的政治主張時認為「直接行動」的革命依據不適用當時社會，但幸德的另一項觀點「走進人民」，其主張由山川均加以發揮而成為勞農派相當重要的行動綱領³⁴。

（二）內閣政府對社會運動的鎮壓

在社會黨第二次大會中，無政府主義派取得光輝的勝利，但是由於「平民新聞」曾詳細刊載二派的演講、辯論內容，致使日本政府藉口幸德秋水倡議「直接行動」論，涉嫌擾亂社會秩序安寧，乃下令禁賣該期。不久日本內務大臣下令禁止日本社會主義信徒們結社。數日後更下令「平民新聞」停刊。停刊令下達後次日「平民新聞」在「廢刊辭」中，沉痛地駁斥日本政府的指控，並控訴日本政府及統治階層對於社會主義的壓迫。次日「平民新聞」停刊，平民社亦隨之解散。平民社雖然遭到日本政府壓迫而宣告解散，但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仍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終於相繼在1908年、1910年爆發「赤旗事件」、「大逆事件」造成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及領導的知識份子極大的衝擊，也宣告了日本黑暗時代的來臨。

「赤旗事件」：

1908年6月26日社會主義份子山口義三出獄當天，社會主義各派群集於神田錦輝館，召開歡迎會。會場中忽然出現一面紅旗，上書「無政府共產」五個大字，監視的警察前來搶奪，遂與群眾發生激烈的衝突，結果堺利彥、山川均、管野須賀子、大杉榮、荒畑寒村、森岡榮治、宇都宮卓爾等十三人被捕；事後警察又於神田錦輝館的牆上發現「一刀兩斷帝王頭，落日光寒巴里城」的詩句，益發刺激日本政府，遂決心更加嚴厲取締社會黨人。同年8月，對赤旗事件進行判決，量刑之重出乎意料，大杉榮監禁2年半，堺利彥和山川均為2年，荒畑寒

³⁴ 事實上，當時的日本社會根本沒有革命性直接行動的條件。「日比谷燒打事件」、「反電車票價上漲事件」及「足尾礦山騷動事件」幾乎都跟勞工沒有太大的關係。再者，勞工階級自日俄戰爭以後，以逐漸被資本家用溫情主義的日本經營方式（如終身雇用）所整編，直接行動論的革命依據幾乎已經喪失；另外幸德秋水的另一論點『走進人民』，由山川均加以發揮，1907年4月出版《平民主義》一書，書中開頭設有〈走進人民中〉，山川均提到：「…要聳動全國，必須先聳動居全國最大多數的地方農民；要恩政謂社會主義盡力，就得在地方謀職，不論中小學教員、醫生、官吏、小商人、畜牧、營農都好，一面從事自己職業，一面與農民直接接觸，逐漸向四週的人宣揚社會主義，感化他們，也就是走進人民中，與人民一起居住。」這便是幸德秋水『走進人民中』的觀點。

村為1年，這是後來陰謀製造的大逆事件的開端。

「赤旗事件」發生後，到了8月，西川、山口、吉川守國、岡千代彥、樋口傳等人因公佈對“反對電車票價上漲大會”的判決而入獄，於是直接行動派的主要成員幾乎都失去行動自由。而日本統治集團認為西園寺內閣取締社會主義不夠徹底，1908年7月，以桂太郎取代西園寺第二次組閣。他按照山縣有朋的旨意，推行取締社會主義運動的政策。桂太郎在其政治綱領中寫道：“如彼之社會主義今日尚不過是纖纖一縷之煙，然而若舍之不顧，他日勢將至燎原，將及噬臍之禍。”在桂太郎內閣時期，《東京社會新聞》、《東北評論》、《平民評論》、《自由思想》、《世界婦女》等社會主義刊物均被禁止發行。警察當局對社會主義者進行跟蹤，實行告發、拘禁和處罰。桂太郎內閣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政策，不同西園寺內閣時的“防止事犯”，而是對社會主義者採取“誘發犯罪來撲滅”的方針。在天皇政府的高壓政策面前，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動派束手無策，提不出正確的對策，而走上了無政府主義的“個人恐怖”道路，政府官僚便利用直接行動派策略上的失誤，而施展了“極兇惡的計劃”。

「大逆事件」：

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宮下太吉、管野須賀子、新村忠雄等人為了反擊政府在赤旗事件以後的種種鎮壓，意圖向專制政府的象徵—天皇投擲炸彈，以證明天皇不是神，也是留著人血的人。來破除日本國民對天皇的迷信。1910年（明治43年）5月，政府得知宮下太吉與管野須賀子等人想暗殺天皇的計畫，將他們逮捕；而幸德秋水因與管野須賀子同居，又是無政府主義的領袖，更與宮下等有關係，也以首謀被捕³⁵。這次事件是因陰謀暗殺天皇，所以在日本史上稱為「大逆事件」。桂太郎內閣為一舉撲滅社會主義運動，乃利用這次「大逆事件」擴大偵辦。其實跟這次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僅六、七人；例如最初犯人只有幸德、管野、宮下等七人，後來卻擴大到二十六人。宣判死刑的共有二十四人，宣判次日又特赦十二人，改處無期徒刑。1911年，幸德與管野十二人被送上了絞刑台。

（三）大逆事件後的影響

在大逆事件中，天皇政府成批殺害社會主義者的暴行，激起了日本人民的

³⁵ 關於幸德秋水是不是真正參與製作炸彈的過程，迄今仍是一個謎，日本學者研究當時幸德秋水對宮下提出的“暗殺天皇”的計畫難以接受，決定放棄自己的革命計畫，從事日本歷史及「基督抹殺論」的著述，管野須賀子還因幸德放棄革命計畫，而與幸德秋水決裂。

極大義憤，世界各地也掀起了抗議日本政府暴行的怒潮。美、英、法國都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的抗議³⁶，日本政府為平息各國的抗議活動，趕緊向各國公使館發送了《逆徒判決證據說明書》，聲稱審判手續如何合法，被告人是無政府主義者，極盡開脫狡辯之能事。在日本國內，政府血腥鎮壓社會主義運動，給各階層很大衝擊。在大逆事件後，政治越來越反動。1911年8月，警視廳設立“特別高等警察課”。這種特別高等警察，在日本通常簡稱“特高”。“特高”實際上是一種特務警察，專門從事鎮壓社會主義運動。從此，日本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行動，被特務嚴密監視。他們經常受到無理傳訊、拷打、關押直到殺害。政府當局把無數革命者投進監獄，收繳所有的社會主義書籍，使社會主義運動暫時進入低潮。

而分析明治時代的社會主義雖然受到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影響，卻沒有走向教條化，擁有相當的自主性，跟1920年代後半期受第三國際支配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相當不同，因此「階級鬥爭」、「前衛黨」之類的概念都很少出現。論者常以這些概念的出現與否，來評估明治社會主義運動的成熟度，卻因此喪失了自主性。（李永熾，1989：29）

第四節 日共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

明治維新³⁷標誌著日本近代史和資本主義的開端，對往後的日本經濟、政治、工農運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成為了日共之所以產生的經濟、政治、思想和階級基礎的積累，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面臨的內外形勢則是日共成立的直接依據。在日本資本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急速發展、且有封建統治與盡帶警察制度相結合的國家全力之下，日本共產黨乃是經過了極其崎嶇且慘烈的途徑得以誕生並成長起來。

一、「日本共產黨」的建黨及綱領路線

³⁶ 1911年1月21日《大阪朝日新聞》報道，美國社會主義者正在向日本政府的判決發出抗議，並報道了美國優秀現實主義作家傑克·倫敦發表的評論。傑克·倫敦說，只有對幸德秋水等人寬大處理，才能表明日本是個文明國家。他強烈要求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共同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在美國雜誌上介紹了事件的經過，並譴責日本政府的暴逆。在英國，社會主義者舉行了示威，發往日本大使館的抗議書和質問信，每日達數百封之多。1911年12月20日，在倫敦召開了抗議日本政府暴行的集會，有1萬5千人參加。在法國也掀起了抗議活動。

³⁷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1852-1912）執政期間的年號（1868-1912）。狹義的“明治維新”是指1868年日本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政權；廣義的“明治維新”是指一系列歷史事件所構成的社會變革的全過程。曹天祿：2004，1。此處解釋所指的是廣義上的。

(一) 「日本共產黨」的建立過程

1910年的「大逆事件」發生後，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者雖沉寂了一段時間，但未過多久，共產主義運動又起燎原之勢³⁸，但從成立的領導者及組織的屬性看來，日本社會主義開始崛起時是參雜了社會主義流派如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混雜，在確切的思想、組織及行動方面也未見到明確的分化。到了1917年（大正6年），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及國日本國內外經濟情況日益惡化而導致發生「米騷動」事件，共產主義者認為國內萬的國際情勢皆已成熟，此時在國內發展共產運動是極為有利的狀態。因「大逆事件」僑居美國的片山潛與近藤榮藏為了加緊推行共產主義運動，乃決定近藤榮藏先返回日本、片山潛則繼續留在美國跟莫斯科的托洛斯基取得聯繫，準備從國外協助推行共產主義運動。

近藤榮藏返回日本之後遍訪當時著名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山川均（馬克思主義者）、堺利彥（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大杉榮（無政府主義者）等人，對他們極力勸說組織共產主義「黨」，但這些理論家鑒於「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的慘死，所以不敢冒然答應近藤榮藏的關於組織「黨」的提議，只在1918年（大正7年）創立東京大學的「新人會」，並由大杉榮與堺利彥在1920年（大正9年）創立「日本共產主義同盟」。在此之後，近藤榮藏一直努力奔走於聯絡共產東方國際局和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者³⁹，並在1922年與日本七位共產代表遠赴莫斯科接受共產主義的特訓，準備回國後著手日共的建黨工作。

在莫斯科接受共產國際訓練的這群日本代表重返東京後，日本的建黨工作乃急速開展，在1922年（大正11年）7月15日召開秘密組織的「日本共產黨成立大會」（所謂「第一次日共建黨」），選出中央委員長堺利彥、中央委員堺利

³⁸ 1912年（大正元年）8月，日本勞動運動的先驅者鈴木文治創立了「友愛會」（「日本勞動總同盟」的前身）、並發行月刊「友愛新報」（後改爲「勞動與產業」）；1912年10月，大杉榮（無政府主義者）與荒畑寒村（共產主義者）創立了「近代思想」，鼓吹「工會組織主義」（Syndicalism）的勞動運動。

³⁹ 近藤榮藏在日共建黨之初一直努力的奔走聯絡俄國東方國際局和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者，1921年召集同志秘密結成「曉民共產黨」（是日本最初標榜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團體），但在同年11月就因被檢舉而遭潰滅；在1922年又與德田球一等代表參加莫斯科舉行的「東方民族大會」，在與會之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隨即將近藤與其他的日本代表改造爲布爾什維克的信奉者，經過兩年的特訓後送回日本擔任建黨工作。參閱史明：1998，582。

彥、山川均、荒畑寒村、近藤榮藏、高津正道、橋浦時雄、德田球一等七人，並在同年 10 月的「共產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上被允許加入成為「共產國際日本支部」。

（二）、日共 1922 年綱領中的「二階段革命論」

1. 「二階段革命論」

當日共在莫斯科被允許加入共產國際時，布哈林隨即起草有關日共的「規約草案」及「綱領草案」交給德田球一，所以此草案又稱為「一九二二年綱領」或「布哈林綱領」，德田球一將草案帶回日本後，隨即在 1923 年 2 月的「第一屆黨代表大會」及同年 3 月召開的「臨時黨代表大會」中將草案提出討論。「一九二二年綱領」中將日本認定是封建殘餘占優勢的半封建國家，天皇與大地主及大資本家掌握國權，壓迫國內處於弱勢的弱小農民及無產階級。綱領中規定「日本革命」的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協助農民與中小資本家來打倒「天皇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再往下的第二階段才是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這便是所謂的「二階段革命論」。

由布哈林起草的日共綱領雖是交與日共自作討論，但根據共產國際的加入條件，起草綱領的接受是成為加入共產國際的必要條件。在討論綱領是否可行的過程中，由於要根據日本國內的實際情況來作討論，在綱領中的兩個問題便引起爭論：

（1）對於二階段革命論表示有疑問，大多數都主張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即「一階段革命論」；

（2）綱領中提出廢止天皇制，但在當時的治安環境中若主張打倒天皇，便是遭受到像「大逆事件」中幸德秋水的下場，不然，也會被深信天皇的一班民眾所唾棄，所以與會的同志都不敢多作議論，只得勉強付於決議通過。

但此時日共組織早已被警察特務所滲透，應為機密的大會紀錄也被日警掌握，所以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共產黨終於被一網打盡（1923 年 6 月的第一次檢舉逮捕 100 餘人），其中佐野學、近藤榮藏等幹部因預先知情逃往莫斯科所以倖免於難。其餘被捕的日共幹部因日警一連串對共產主義者的屠殺⁴⁰在獄中均惶惶終日，紛紛

⁴⁰ 1923 年（大正 12 年）9 月 1 日發生著名的「東京大地震」，在社會動盪民心不安的情況下，

向警察當局投降輸誠，並以「被告團」的名義隨即宣布解黨，而後才盡被假釋。1924年（大正13年）3月，被釋放的山川均、堺利彥、德田球一、野坂參三、市川正一等黨的領導幹部乃會合於東京大森區，終於正式議決並宣布解散日共。

2. 第二次日共建黨與上海會議一月綱領

當日本的共黨領導者正式議決解黨時，莫斯科正召開「共產國際第五屆代表大會」（佐野學、近藤榮藏代表參加），東京的解黨派之一的荒畑寒村前後三次前往莫斯科請求共產國際對於解黨之事予以同意，但均遭到共產國際的拒絕。共產國際隨即成立了「日本委員會」，並指示佐野學負責黨的重建工作，同時下令召及所有的日共幹部在上海召開會議。1925年1月的「上海會議」上推舉新的委員長德田球一、中央委員佐野學、渡邊政之輔等六人，重新成立黨的領導核心並負責黨的重建工作，即所謂的日共第二次建黨。共產國際同時在上海發表有關日共重建工作的指標，即是所謂的「上海會議一月綱領」，綱領中特別指出：

（1）黨的崩潰乃以缺乏對革命工作的規律、覺悟及知識為最大原因；（2）今後必須少作抽象的理論宣傳，多抓實際問題從事具體的組織工作；（3）地下活動的工作並非一朝一夕，必須透過具體的日常工作來實際蓄積經驗才可；（4）盡早創刊黨中央的機關報紙。日共建黨工作在共產國際的嚴格監督之下，黨員由最初的六人幹部擴展到紀錄最多的六百餘人，這是由於日共外圍勢力的雄厚所致。

日共本身的黨員不多，但學生與廣大的勞動者都是日共宣傳理念的重要對象，日共在學生及勞動者間成立宣傳組織，最主要的有：

（1）「學生連合會」：是以東京大學的「新人會」為核心，結合了五十餘所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會員有一千八百餘人。1926年1月發生「京都學運事件」，有不少學生被逮捕，但從此培養野呂榮太郎、志賀義雄、田中清玄、中野重治等後進領導幹部；

（2）「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是從勞動中心的「日本勞動總同盟」分化出來而成立的，後改為「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從此輩出了純粹的的勞動者出身的日共領導幹部如：渡邊政之輔、山本懸藏、杉浦啟一、鍋山貞親、三田村四

日本軍閥及右翼份子趁機企圖消滅所謂不良朝鮮人與共產主義者而施展大屠殺：（1）「朝鮮人大屠殺事件」（僑居東京一帶的朝鮮人被暴徒殺害六千餘人）、（2）「大杉榮慘殺事件」（大杉榮味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及其一家大小都被憲兵大尉甘粕正彥非法逮捕後慘殺於憲兵隊的內庭）、（3）「龜戶事件」（在渡邊政之輔領導下的南葛勞動組合幹部川合意虎等九人遭到龜戶警察慘殺）。

郎、春日庄次郎等……

以往日警在取締共產活動時，是根據 1900 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用以壓制當時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但日共在第二次建黨後，對學生及勞動團體的黨團工作獲得極大的響應，使得日警憂心，促使當局迅速制定了「治安維持法」，「治安維持法」相較於「治安警察法」更加嚴厲殘酷，這也是日本當局為鎮壓社會主義傳播的有力工具。

（三）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共產國際不僅直接幫助了日共的建立，而且對日共綱領草案制定也給予許多指導，在布哈林指導下所制定的「1922」年綱領中的「二階段革命論」，更是清楚規範了日共的性質以及在日本社會革命中的領導核心作用。但共產國際對於日共革命路線的判斷卻也造成了日共在宣傳革命活動上的絆腳石，更有因日共黨員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因在綱領起草的意見上不合，有日共幹部反對共產國際指令的情況發生。

1. 糾正日共黨內的左、右傾錯誤

日共在剛成立不久，就遭到日警的殘酷鎮壓，如前述的 1923 年大鎮壓，使得黨內出現了右傾取消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和宗派主義等路線，黨內意見的分歧更給日共黨內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在共產國際決定協助重建日共時，便讓第一次創黨元老德田球一等六人，到莫斯科重新接受思想上的訓練。這麼一來，使得存在於日共黨內的「解黨派」及右傾思想力量頓時削弱，存在於日共黨內多時的思想辨正路線爭議，也因為共產國際的強勢介入而被強力壓制。

但在共產國際協助制定下的日共綱領，卻也明顯有過於“左傾”的特性。「1922 年綱領」中提到“日本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將在強大的工人階級和以廢除地租為目標的革命的農民群眾出現之後始能出現”以及“日本資產階級民主將以很快的速度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其中明顯含有過“左”的情緒；而後共產國際逐漸對日本實際的社會情勢加以了解，修正其過於偏左的綱領路線，共產國際在其後的「1931 年綱領」和「1932 年綱領」都已修正了極左主張帶來的危害，這對其後的日共領導方向、政策和策略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2. 對日本社會革命情勢的錯誤判斷

共產國際在估計日本革命形勢、認識日本革命與世界革命關係和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等方面卻存在著嚴重錯誤，給日共帶來了巨大損失。

(1) 低估了日本天皇制在日本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天皇制在 20 世紀 20 年代已發展成為與法西斯軍國主義相結合的天皇制，且天皇制在日本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制度中具有絕對的統治力，和封建地主與壟斷資產階級的結合，使國家統治機構具有強大的內聚力。而廣大群眾的心態也因處於這樣的國家體制，培養出逆來順受的心態，西方的自由民主及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未能對多數人民產生衝擊，更由於其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和地理位置，加速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2) 過高認為日本已具備革命的主客觀情勢

共產國際在對日本革命形勢的判斷上，過高的認為日本已具備了革命的主、客觀形勢。在「1927 年綱領」中認為“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鞏固性日趨動搖”、“主觀革命形勢（即指工人農民群眾的革命化）正蓬勃的形成與發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日本政府透過治安維持法對日共進行全面的監視與控制，在之後的「1932 年綱領」通過後，日共又遭受政府發動的“三一五”和“四一六”等數次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日共所處的革命情勢其實是非常艱辛的。

(3) 日共統一戰線的極左路線錯誤

共產國際在日共綱領的制定中，對當時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自由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階層採取打擊的極“左”政策。「1927 年綱領」將所謂“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叛變視為共產黨最緊急的鬥爭任務之一；「1932 年綱領」更將左、右翼全部定為“社會法西斯主義”，將社會民主主義推至法西斯主義方向，根本壯大了軍國主義的勢力。

而在共產國際協助日共第二次建黨時，於 1925 年（大正 14 年）6 月派來共產國際代表 Jansen，日共在 Jansen 的指導與監督及資金援助下進行地下活動，並以合法為掩護創刊《無產者新聞》（由佐野學擔任主筆）。但因日共幹部佐野文夫等因所起草的大會宣言及綱領遭到 Jansen 的反對，所以當 Jansen 帶著共產國際建議召開「黨重建大會」的指令時，便遭到佐野文夫等人的反對，成為日共第一

次反抗共產國際的先例。

二、日共黨內的理論分歧及爭議

當時在日共及共產主義者之間，有所謂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之爭。1927年7月由共產國際和日共代表共同作出的《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二七年綱領》），批判了山川均的取消主義和“左”傾的福本（福本和夫）主義。

（一）「山川主義」（Yamakawa-ism）的理論介紹：

是由老馬克思主義者山川均所提倡，山川主義的主要重點在於：

1. 需創造合乎日本社會現實的革命理論：

列寧主義不外乎是把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俄國的特殊環境而成的、所以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的經驗無條件移植到日本革命的實務上，必須將馬克思理論與日本社會現實相結合，並創造出一種合乎日本革命的新方法才行。

2. 應行使「一階段革命論」：

山主義認為日本天皇只是封建制度的遺物而已，一切的國權是掌握在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中，所以日本革命應該是行使反資本主義的「一階段革命論」。

3. 反對以非法組織型式從事鬥爭活動：

山川均反對以非法組織「共產黨」從事秘密活動，也因他此種主張所以被稱為「解黨派」；認為在當時的日本，並不具備建立日共的條件，甚至認為“建立共產黨本身就是錯誤的”⁴¹他認為應以「合法政黨」的型式結合一般大眾（如勞工、農民等等…）從事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4. 日本革命情勢未成熟：

山川均派認為日本資本主義正在發展過程中，所以革命情勢尚未成熟，在這樣的社會情狀下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未必能引起全體民眾的響應。

5. 無產階級意識乃是隨著革命情勢的發展而自然發生於勞動者之間。

6. 盲從共產國際的指令是錯誤的，應該建立一個日本特有的革命路線。

⁴¹ 山川均主張解散共產黨，進行合法鬥爭，黨內出現了“取消主義”和“失敗主義”的思想，這樣的主張得到了日共中央一些人的支持，並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而另一批人雖不是以革命條件的具備與否來贊成解散黨，但也已當時共產黨存在的種種弱點和錯誤為理由，主張應先解散黨，等到建黨基礎較為牢固時再重建共產黨。資料參考自日共中央委員會編：1986，21。

（二）「福本主義」（Fukumoto-ism）的理論介紹：

早在 1924 年的 2~3 月間，山川均等人在沒有召開黨代表大會和得到共產國際的許可下，就自行做出「解黨」的決議，而解黨的決議遭到了黨內其他領導者，如渡邊政之輔、德田球一等的反對，以及共產國際的猛烈批評。而在山川主義出現不久之後，日共黨內即出現了「福本主義」的理論思想。

福本主義是由新進的馬克思主義者福本和夫所提倡，福本主義的理論重點在於：

1. 以「理論鬥爭」為手段清除動搖份子：

福本和夫認為「共產黨」應該是純粹馬列主義的黨，必須先透過激烈的理論鬥爭先來清除（分離）不徹底的馬列主義動搖份子，在將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純粹的黨。

2. 應行使「二階段革命論」：

福本和夫認為天皇與大地主及大資本家掌握國權，壓迫國內處於弱勢的弱小農民及無產階級。所以應將「日本革命」的第一階段定位為無產階級協助農民與中小資本家來打倒「天皇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再往下的第二階段才是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這便是所謂的「二階段革命論」。

3. 共產黨員應該是少數精銳的職業革命者；

4. 日本資本主義已在崩潰過程中，而革命情勢業已成熟；

5. 宣傳共產活動雖應與勞動組織結合，但勞動者具有工會組織主義、經濟主義等屬於隸屬資本主義的思想傾向，所以要由知識份子從外界般進階極意識與革命意識才可使勞動者參加革命鬥爭。

6. 日共必須遵守共產國際的決定與指示，不能有任何的自主路線。

（三）左、右傾路線的爭議：

一九二七年，日共為了釐清「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的理論爭議⁴²，片山潛召集代表至莫斯科檢討。當時德田秋一、渡邊政之輔、鍋山貞親、福本和夫等日共領導者皆在莫斯科參與了這次的討論，由於當時山川主義提出不應盲從共

⁴²據 Frank S.T. Hsiao（蕭聖鐵）& Lawrence R. Sullivan（1983）認為，欲評估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對台共明確的影響究竟如何是困難的，但在 1930 年以前其對台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是明顯的。：另相關爭議可參閱市川正一：1954；史明，1998，頁 565—567。

產國際，應建立起符合日本性質的革命路線，福本主義則認為共產黨員應為少數精英主義的職業革命者，共產國際為此成立了「日本特別委員會」，批判其錯誤，並於會後訂立了「一九二七綱領」（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綱領中整肅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的缺陷；會中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常任委員。片山潛會後告訴其他委員並在會議中決議，「日本無產階級必須援助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要幫助臺灣無產階級建立共產黨。」未來的台共組織，就在共產國際與日共的這個決議下，由台灣殖民國一方的日共負責領導，在台灣建立共產黨；在台灣尚未獨立之前，以民族支部附屬於日本共產黨⁴³。

將知識份子視為革命先鋒的福本主義獲得當時共產黨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但日共黨內的革命力量卻也因相互鬥爭的激烈而嚴重內耗黨內力量，日共黨內的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的爭議更是影響到深受日本影響的台灣政治抗爭。連溫卿策動無產階級文化啟蒙運動深受日本山川均的思想影響，山川主義為福本主義所批判，激進思想抬頭，於是連被視為落伍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分裂、投機、地盤主義者」，於1929年11月新文協第三次全島大會時被開除會籍。由此可見，山川、福本兩派路線的鬥爭不單純只是日共黨內的路線爭議而已，也是決定影響當時台灣政治抗爭團體的重要政治理論。

三、日警對日本共產黨的鎮壓

1928年2月，日本政府施行「普選」，日共指導部也在此時接到上海東方局的指令「必須利用選舉在大眾面前公然展開宣傳，藉以擴大黨勢」，於是日共藉著左派無產政黨「勞農黨」為合法掩護，推舉德田球一等十一人參加普選，選舉結果雖全數落選，但卻獲得有效投票的四萬票票數，而且因為在競選廣告單中極力宣揚共產主義的主張，讓一般大眾知道日共的存在，成功達成了宣揚共產革命的目的。但也因為如此，引起了日警的注意，終於進行全國的大檢舉。

在日共成功宣傳他們革命主張的同時，此時日警特務也已秘密進入日共的領導中樞，完全洞悉他們的內部機密，終於在1928年（昭和三年）3月15拂曉在全國進行寸草不留的大檢舉。被捕的日共及關係者達三千四百餘人，雖然日共的重要幹部如佐野學、渡邊政之輔、鍋山貞親、市川正一等都僥倖脫險，

⁴³在共產國際將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結合討論的背景下，一九二七年的日共綱領，提出「殖民地完全獨立」的主張，並規定日共須對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保持密切聯繫，在思想與組織上給予支援。參若林正文，1975。

但做為共產黨外圍宣傳組織的勞農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學生聯合會、東大新人會及各個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宣傳社會主義極共產主義的學術團體，都一律被強制解散，甚至在大學任教的著名共產主義學者如京都大學教授河上肇、東京大學教授大森義太郎等…也一一被學校驅逐。

（一）渡邊政之輔的死亡對台共的影響

但較為重要且影響台灣共產運動的事件則是渡邊政之輔的犧牲。渡邊在成功逃離三一五大檢舉後，來到上海與台共幹部林木順碰面，並聽取林木順有關台共狀況的報告，並和台共的中央委員會共同擬出台共未來的指導路線。1928年10月6日，渡邊政之輔被懷疑是為攜帶台共的重要指示被日警盤查而犧牲⁴⁴，關於此點因日共刊物曾指出「渡邊同志前往台灣，負有重要的任務。由於不能逃脫危險，他毅然自殺以保護黨」（沿革誌：669-670）

但關於渡邊的死亡原因卻有不同的說法⁴⁵，但不可否認的是，若是渡邊能夠安全抵達台灣，應該能夠改變台共未來的命運，在渡邊政之輔死後，台灣的農民組合幹部在1929年2月被逮捕，4月東京特別支部也被日警所破獲，切斷了台共與日共間經常性的聯繫，而台共的黨員在宣傳運動時也陷入孤立，台共在此之後只有聽從第三國際的指示和尋求中共的幫助，但也造成台共間分崩離析的權力鬥爭局面。

（二）日本共產黨戰略路線的潰滅

經過三一五及其後的四一六大檢舉後，日共的整個組織實際上已遭受過毀滅性的打擊。重整日共黨的路線似乎非常困難，也找不到一個能支持黨內路線的目標。但在1928至1930年時，因為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呈現蕭條之勢，史大林所說的「第三期」危難看似即將到來，在世界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也有勞動者與警察衝突的事件相繼發生，因此在四一六大檢舉之後，重建日共的鬥爭路線就注重在武裝鬥爭方面，這便是共產主義所稱的「極左路線」。但當時遍佈

⁴⁴ 1928年10月6日，警察對停泊在基隆港的「湖北丸」輪船進行檢查，這艘船的目的地是日本，檢查中發現一位穀物商的政件不合規定，又在他的行李中發現大批外國證券。穀物商在行將被壓往辦公處所時拔出左輪槍，槍擊日警成重傷後企圖逃亡，最後在警察的包圍下舉槍自殺，日本內務省的報告中顯示，這個涉嫌人事實上就是日共新書記長渡邊政之輔。參閱盧修一：1989，92。

⁴⁵ 日共在其黨史中，始終聲稱渡邊被警察「謀殺」。但到了1972年，卻改口說渡邊是「自殺」的。參閱：立花隆，《日本共產黨的研究》上冊，頁297-298。根據 Beckmann & Okubo，渡邊到台灣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台共的發展組織（1969:171），但是他們對此說法並無提供任何證據。資料來源盧修一：1989，101。

全國的日警「特高課」勢力將這些日共的秘密組織一一破獲，日共的武裝鬥爭又宣告終結。

殘餘的日共黨員又重新計畫著關於重建日共黨的工作，共產國際為適應當時的世界情勢與日本國內情勢，乃在 1932 年 5 月發出了「關於日本的情勢與日本共產黨任務的綱領」（即所謂的一九三二綱領），指示日共必須遵守這個戰略路線，但共產國際對日本革命的戰略路線過於頻繁的更改⁴⁶，使得重建後的日共中央對於共產國際的指令根本無所適從，各個階層的日共黨員在思想上及戰略上的混亂情形造成黨員相繼脫離共黨組織。在此之後著名的黨員及學者等相繼被警察當局逮捕，1932 年 10 月又發生「川崎第百銀行強盜事件」，事件發生後日共更是受到日警的嚴密監視，日共領導部已被日警特務全面滲透，至此，戰前的日本共產黨已告潰滅，現存的日本共產黨是 1945 年才開始的。日本共產黨和隸屬於它領導的臺共的命運上似乎有雷同之處，都是因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無所適從與黨內鬥爭路線的爭議，導致黨終究走上潰滅一途。

⁴⁶ 例如一九三二綱領即馬上推翻一九三一綱領所做出的路線指示。由布哈林起草的二二年綱領及二七年綱領，因布哈林在 1929 年被史大林整肅，由布所起草的綱領也被推翻，改由薩發爾夫及風間丈吉代為起草一九三一綱領；然而薩發爾夫後又因托洛斯基派的名義被史大林整肅，所以一九三一年綱領被廢除，導致一九三二年綱領的出現。